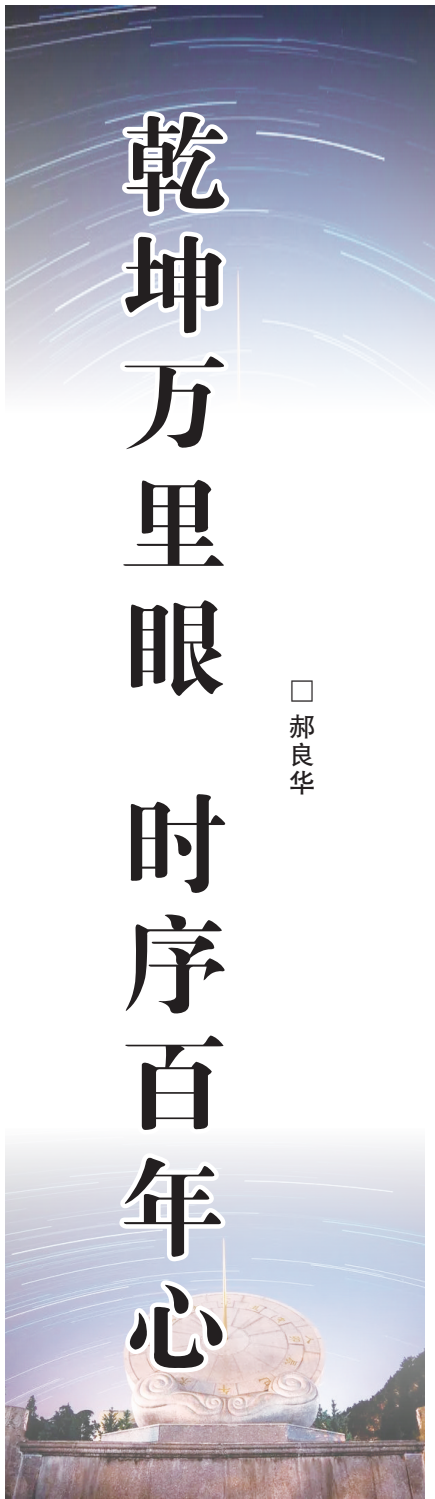




□ 郝良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的《出塞》，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而最精妙的，便是开头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用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互文见义”，用秦时、汉时设定时间跨度，勾勒出关山月，晕染出伤离别的苍凉感。眼前的明月，是曾照耀过秦汉的明月；眼前的边关，曾是秦汉战事一直未曾间歇的边关。开篇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境和穿越时空的历史感。

“时”是会意兼形声字，是“時”的简体字。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说文解字》古文里的“时”字均写作“𠂔”，上部为“日”，表示行进，下部为“寸”，表示太阳的运行。古人计算时间，是根据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或者它在地上投影变化的情况来确定。繁体的“時”字则出现较晚，睡虎地秦简里的“時”为小篆，止已变为寺，由“日”“土”“寸”组成。《说文解字》解释为“時，四时也，从日寺声”。段玉裁注：“（时）本春夏秋冬之称，引申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把太阳的运行描述得更细致：太阳的影子是一寸一寸从土地挪移过去的，测日记时。由此，“时”既表示每日的时间流光推移，也表示每年的四时轮转更替。

“时”与“天”合，组成“天时”，顺天应时，观时顺变。《尚书·舜典》里有一句话，叫“食哉唯时”，意思是解决老百姓粮食问题的关键是把握时令、顺应天时来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无不把“敬授民时”作为施政的首务。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很深，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农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的命题，并以当时主要粮食作物为例，详细说明了庄稼“得时”“先时”和“后时”的不同生产效果，指出“得时之稼”籽实多、出米率高、品质好，味甘气章，服之耐饥，有益健康，远胜于“失时之稼”。西汉《汜胜之书》讲旱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趋）时”为首。北魏《齐民要术》则拟定了各种作物播种的“上时”“中时”和“下时”，施肥要讲“时宜”，排灌也要讲究“时宜”。可见，中国古人观察日月轮换，推测草木荣枯，揣摩天地性情，应和着大自然的时令和物候来安排生产生活的节奏和律动，“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从而做到顺天应时。古人把世间的一切变化归因于时间的流转，而时间的流转传递的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时”便从最初单纯的时间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概念，集中体现出古人“顺时”的信仰和原则。与此同时，儒家还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动植物既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同时这些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在

利用自然资源时要讲究时节，遵循生物的生长规律，主张“取物顺时”。《礼记·王制》里就有这样的法令：“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就是说，对山林、山麓、川泽等自然资源，要按照相应的季节进行采伐、狩猎和采集。孔子十分热爱生命，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孟子根据动植物依“时”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主张循节气变化“不违农时”。如此，既保护了环境，也保证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白圭，善于“乐时观变”。他认为，商家“知时”，就要根据气候周期的往复变迁、农事的丰歉，作出明晰的判断，及时调整经营手段和方法。白圭的这种经商思路和方法，是察时顺变、顺天应时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中国智慧。

“时”与“机”合，组成“时机”，恰逢其时，与时偕行。中国古人不但观察天地万物运行之道，还关注人情事变的规律。事物的“变”是必然的、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铺陈展开和演变更替的。人的行为在不违背天时的大前提下，要取得最佳成效，就要善于把握时机、创造时机、捕捉时机。古人说“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说的都是行动要把握正确时机，行为要“合时宜”。很多事，只是因为没有在合适的时机去做，好事才变成了坏事，这便叫作“不合时宜”。“雪中送炭”，是因为添碳送暖在冰雪中正合时宜，恰逢其时；而“秋扇见捐”，也是因为扇子送凉在秋天不合时宜，才会被弃置一旁。究竟是及时雨，还是过时黄花，全在于对时机的把握。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叛乱不息、异族入侵、外患踵起。面对国家的危局局面和险恶形势，陆贽忧深虑远，在贞元九年上疏《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全面阐述了对于边防守御的策略、设想“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就是说，要顺应、把握时机，采取灵活有效的策略处理问题才是正确的。食古不化，不能顺时达变，则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

“时”与“势”合，组成“时势”，因时顺势、审时度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时”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时间刻度和参数，“时”往往与“势”紧密相连。“时”是不可逆转的，“变”是不肯停歇的，在时间的酝酿下，“势”则是顺时而生、不可阻挡，事物在因势、借势、趁势中发展和壮大。正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大势、趋势。正如《易传》里讲：“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事物的静动行止只有适应了时势的变化发展，才能有光明的前景。《孟子·公孙丑上》开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向老师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假如孟子当政于齐国，能否取得像管仲一样的成就？孟子具有“知人论世”的卓识，集中呈现了他对“时势”的重视。孟子认为，齐国人只看到管仲有本事，但是忽略了研究各国的形势，最终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同时，孟子还为公孙丑剖析了文王、殷纣之际的时势，认为即使如武王、周公那样的明君贤相，如果不研究、把握当时的形势，不能把握时势，也很难治理好国家，指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铍基，不如待时。”正如《鬼谷子》里讲：“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只有把握历史时机、洞察历史大势的才是明白人，能够顺应历史大势的才是智者。宋太宗年间，将领崔翰随军出征太原，太原平定后，宋太宗要对幽蓟（今华北地区）采取行动。然而，诸将认为刚刚经过大战，此时军队人困马乏、粮饷缺乏，不宜再战。唯独崔翰独具慧眼，看出收复失地是大势所趋，并且时机成熟，凭借宋军兵强马壮的“势”，借助平定太原的有利时机，应该乘势出兵取得幽蓟，遂奏曰：“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当前的大势，不可以失去这个时机。太宗谓然，决议北伐，宋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幽蓟遂被收复。

“时”既是一个静态名词，如过去的时间永远凝固在那一刻；“时”更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无穷无尽，永不停歇。人要跟随它的脚步，与时偕行、与时俱进，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专注当下，惜时、守时，创造和把握时机，谋势有为，把每一刹那变成永恒。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时间走得再远，初心从未改变。



□ 陈本铎



清代初年，浙东史学派由黄宗羲所开创，该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重史学研究，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清中期出现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章学诚。章学诚（1738年—1801年），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他的《文史通义》在继承浙东史学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倡六经皆史，力主史意（史义），创立了更为完善的史学理论体系，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

史学的源流

在《文史通义》开卷，章学诚即论述史学的源流：“六经皆史也”。章学诚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并不仅是“圣人立言以垂教之经”，而都应视为史学著作。历史上，经史有别的争论早已有了。北宋苏洵认为，经史自古泾渭分明，“经文简约，以道法胜；史文详尽，以事辞胜”。到了明代，潘府、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则认为经史无异，已有“五经皆史”的论述。清中期，章学诚再度提出这一史学研究命题，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在“浙东学术”部分，章学诚阐释：“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孔子倡言“见诸行事”，言天人性命必穷于史，史学所以经世，是史学的根本所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谈论史学。“六经皆史”命题之所以提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六经属政典，记录了中华上古的典章制度，因此史是先于经而存在的。“先王政典”须与“时王制度”有机统一，才能完整理解“六经皆史”的含义。比如《易》以天道切于人事，它因时而制，在致用中不断完善，并不是因循不变，而“变”则是万古恒常的。章学诚由《易》推论《诗》《书》《礼》《乐》《春秋》，甚至凡涉

（上接1版）

二是加速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和升级。人工智能在制造、医疗、教育、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涌现出矿山大模型、气象大模型、交通大模型等一批数字化转型新标杆，创造出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2500多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中，经过AI改造的工厂研发周期缩短了约20.7%、生产效率提升了约34.8%，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开辟出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涅槃重生的新路径。

三是助力宏观经济调控。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科学的经济分析算法模型能够对经济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进一步掌握经济运行态势，助力提升国家经济监测研判和宏观调控水平，为宏观经济调控、产业政策制定等发展改革工作提供决策依据，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形势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思维理念和政策工具也需要深刻变革与创新，如何更加科学高效地调度算力资源、数据要素、数字产能，成为经济运行调度工作的新命题。

以“人工智能+”行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此，要紧密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应用场景丰富的独特优势，通过数据驱动、算法优化、模型创新等手段，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应用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重中之重，也是国际科技竞争的焦点领域。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主攻通用大模型等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建立关键共性技术体系，打造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广泛参与的产学研用创新联合体和新型研发机构，着力实现算力芯片、高带宽内存等关键元器件的突破，加快推动国产大模型创新迭代

著作之林“无一非史”。提出“六经皆史”显示出章学诚泛史学的倾向，但其核心目的还是扩大、深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将史学的源流上溯至六经之前，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畴。同时，“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切人事”的致用之效，在乾嘉时期有着针砭时弊的意义。针对当时“舍今求古”的汉学与“空谈性天”的宋学两个极端导致的僵化学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表现出深刻的“经世致用”理念。

史学的学风

章学诚以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宗旨，提倡学术研究要具备真知灼见，这与清中期的学术风气有关。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写道：“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芜荒。”清中期与明代末期学术“无本空谈”的极端现象相反，自清朝初年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到了乾嘉时期，学者们已形成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治学方式僵化，整日埋头故纸堆，在典籍中寻章摘句，做材料整理、排比、考证等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学者们不谙世事，研究内容琐碎无味，也脱离了社会实际。

在章学诚看来，所谓“功力”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且有着云泥之别。考据学尽管确实有其内在价值，但这种表面化的材料呈现只能是“功力”，做学问则是基于材料的思考与升华，“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已然，因而上闡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微，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所以，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出发点，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一致的，是为了阐发史意，史家通过研究洞察历史发展变化与演进，在著述中扶持世教，匡正人心。

史学的任务

章学诚年过花甲时，撰《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表示：“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这里的“世教”指的是儒家学说。章学诚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史学研究始终有着明确的任务：“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纲纪天人，是说史学不仅要记载人物、事件等基

本要素，还要记载天文等自然现象，以此阐明自然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推明大道，指史学要能总结文明、社会、历史演进变化的成因与经验；通古今之变，是在特定的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结果的过程中，分析其原委，从而在古往今来的世事变迁中发现历史的规律。从这一内容来看，章学诚之所以推崇通史，恰是因为通史更利于在通览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寻找规律与秩序。

史学的任务还在于“史德”的彰显。章学诚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历史研究“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天人之际”所指史实的客观性高于史家的主观性，主观见解不能凌驾于客观史实之上。学者要对历史真实性有尊重的基本态度。“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章学诚所说的“史德”，是端正的治史态度。“欲为良史”，就要先具史德。

通过历史研究，学者应树立社会与“道”的内在联系，明确学者需关注社会“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现实，这是章学诚认为“立言之士”的价值追求。“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章学诚言行如一，他的大半生都在关注学术经世的问题。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后，嘉庆帝赐死和珅、查抄和府，涤荡官场、从谏如流。章学诚多年以来在大江南北游历，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感触日深，在“天子虚已求言”的感召下，他先后撰写《上执政论时务书》《上韩城相公书》《再上韩城相公书》《三上韩城相公书》《上尹楚珍阁学书》《与曹定轩侍御论举书》等6篇政论，痛陈贪官污吏、巧取于民、卖官鬻爵等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

《文史通义》建立了完备的史学理论体系，“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史意”“纲纪天人”“史德”等史学理念深刻影响后世，对史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章学诚还在吸收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方志理论体系，并提出“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以及在地方设立“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以上都综合体现在《文史通义》这部著作当中，也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实现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围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全“人工智能+”千行百业的产业应用生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产品创新、产业聚集、应用赋能的作用，拓展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大力培育人工智能新产品和新服务，促进人工智能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有序赋能重点领域，加强人工智能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对传统产业生产制造全流程、全要素、各环节的升级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引智育才”。根据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趋势加快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机制优化，推进高校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建设，支持大型科技企业和教培机构培育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加强产学研用合作，设立研发基地和实习基地等平台。加强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探索

建立差异化、长周期、多元化的专业人才评价体系。打通科研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的人才循环。同时，搭建对外交流平台、畅通引进渠道、完善人才引进相关服务，为全球人工智能顶尖人才来华工作和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人工智能+科学治理”。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道德伦理和治理挑战问题。要加快构建起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框架，推进国家层面关于人工智能的综合性立法和制度建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升监管手段，构建基于风险等级及权责划分的人工智能技术监管制度。全面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服务管理，健全完善人工智能常态化备案指导和包容审慎监管的工作机制。同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制度规则和技术标准建设，深化人工智能监管领域的国际合作，共同做好风险防范，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共治共享，让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惠及全人类。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局长）